

## 司马光和戎思想述评

■李昌宪

从历史研究中,司马光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历史上战乱、分裂多于和平、统一。因此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即主张和戎。自秦、汉以后,和戎思想即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治国思想的主流。司马光提出了华夷如一、华夷两安的思想,是其中优秀的代表。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司马光;和戎;边疆;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6-0100-08

李昌宪,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93)

改革开放前,中国学术界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评价是负面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被定为保守派,《资治通鉴》是一本为赵宋王朝统治提供借鉴的书,因而也被否定。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称,他“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sup>[1](P9607-9608)]</sup>又在《资治通鉴》卷首,“臣光曰”的文字中开宗明义道: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sup>[1](P2-3)]</sup>

这两段文字表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要揭示的主旨是君臣之间的纪纲、名分,是礼,是等级制度。因此,认为《资治通鉴》是一本为赵宋王朝统治提供借鉴的书,他要维护的是赵宋王朝的统治,是不错的。但是,这个评价是片面的,受那个时代思潮的影响,这一评价是有时代局限性的。笔者认为,在司马光的政治思想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就是维护和平、华夷两安,这一思想被前人忽视了。

### 一、维护和平、华夷两安的治国思想

北宋王朝建立后,进行了20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了五代十国时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真宗即位后,又相继与辽、夏缔结和约。这样,自澶渊之盟后,宋、辽、夏各方都进入了一个长期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司马光政治思想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一贯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因为它是继安史之乱以来250余年战乱不已之后,出现的人民渴望已久的大好的政治局面。这样的政治局面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司马光一生曾多次阐述他的这一思想,其中,嘉祐六年(1061)他初任谏官时,在《进五规

状·保业》<sup>[2](P4702-4703)]</sup>中的论述最为详尽。他说:

自周室东迁以来,王政不行,诸侯并僭,分崩离析,不可胜纪,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于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乱,又八年而合于汉。汉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盗之,十有七年而复为汉。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诛除僭伪,凡十有四年,然后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内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于晋。晋得天下才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构难,群胡乘衅,浊乱中原,散为六七,聚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于隋。隋得天下才二十有八年,炀帝无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于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养其疽囊,以为子孙不治之疾,于是渔阳窃发,而四海横流矣!肃、代以降,方镇跋扈,号令不从,朝贡不至,名为君臣,实为雠敌。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纲颓绝,五常殄灭,怀玺未暖,处官未安,朝成夕败,有如逆旅,祸乱相寻,战争不息,流血成川泽,聚骸成丘陵,生民之类,其不尽者无几矣!于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大勋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后大禹之迹复混而为一。……由是观之,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其间时时小有祸乱,不可悉数。国家自平河东以来,八十余年,内外无事。然则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产,犹以为先人所营,苦身劳志,谨而守之,不敢失坠,况于承祖宗光美之业,奄有四海,传祚万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

在此,司马光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深邃目光,审视中华民族约1700年的历史,希望仁宗能“援古而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把握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从秦汉、隋唐亡国的教训来看,这些强盛的王朝之所以倾覆,主要是统治者“穷奢极欲,繁

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所致。北宋诸帝,自太祖、太宗至于神、哲,均“不治宫室,不事游幸”,无逸乐之弊。但是,北宋王朝处于一个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时代,契丹、党项族先后崛起,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犄角攻宋。因此,宋王朝欲维护长期和平发展的政治局面,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民族矛盾,是深入进讨,消灭辽、夏,收复汉、唐故疆,还是抓住机遇,和平共处,恢复并进而发展经济。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对外政策面前,司马光一生致力于贯彻后一种主张。

早在皇祐元年(1049),司马光年仅30岁时,他的这一思想就已形成。当时,他的两位同年李绚、吕溱奉命出使辽国,他在《送二同年使北》<sup>[3](P136)]</sup>这首诗中写道:“何必燕然刻,苍生肝脑涂。”明确表达了他反对外事四夷、反对战争的思想。

嘉祐六年,司马光上章请求处理轻慢辽使的边臣时,言及澶渊之盟,他说:“切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亲之时,戎车岁驾,疆场日骇,乘舆暴露于澶渊,虏骑凭陵于齐(今山东省济南市)、郛(今山东省东平县),两河之间,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体,得失之至计,亲屈帝王之尊,与之约为兄弟,岁捐金帛以饵之,聘问往来,待以敌国之礼。陛下承统,一遵故约。夫岂以此为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sup>[2](P4721)]</sup>高度评价了澶渊之盟的历史功绩。

治平四年(1067),神宗欲招纳绥州嵬名山部,夺取西夏的战略要地横山。此时,身为御史中丞的司马光连上数章,在《论横山疏》<sup>[3](P380)]</sup>中,司马光着重以本朝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诫神宗:“国朝以太宗之英武,北举河东,南取闽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天下新平,民未忘战,当是之时,继迁背诞,太宗以郑文宝为陕西转运使,用其计策,假之威权以讨之,十有余年,卒不能克。发关中之民,飞刍挽粟,以馈灵州,及清远军为虏所钞略,及经沙碛,饥渴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号哭满道,长老至今言之,犹歔歔酸鼻。及真宗即位,会继迁为潘罗支所杀,真宗因洗涤其罪,吊抚其孤,赐之节钺,使

长不毛之地,讫于天圣、明道,四十余年,为不侵不叛之臣。关中户口滋息,农桑丰富。由是观之,征伐之与怀柔,利害易见矣。及元昊背恩,国家发兵调赋,以供边役,关中既竭,延及四方,东自海岱,南逾江淮,占籍之民,无不萧然,苦于科敛。自其始叛,以至纳款,才五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复。仁宗屈己,赐以誓诰,册为国主,岁与之物,凡二十五万,岂以其罪不足诛而功可赏哉,计不得已也!”因此,中原王朝对待夷狄的基本原则与传统政策是“或怀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边境,中国获安则善矣。不必以逾葱岭,诛大宛,绝沙漠,擒颉利,然后为快也”。

熙宁三年(1070),当时,变法机构相继成立,新法陆续颁行,司马光坚决反对新党的聚敛政策,他认为这将激化阶级矛盾,为此,他再次提醒神宗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他规劝神宗说:“自周末以来,至于国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间乱离板荡则固多矣,至于中外无事不见兵革百有余年,如国朝之盛者,岂易得乎?此臣所以尤为陛下痛惜者也。”<sup>[3](P408)</sup>

元丰五年(1082),司马光轻度中风,于是预作《遗表》<sup>[3](P180)</sup>。在《遗表》中,他反对神宗“从事于四夷”,规劝神宗说:“借使能逾葱岭,绝大漠,尘皋兰,焚龙庭,又何足贵哉!自古人主喜于用兵,疲弊百姓,致内盗蜂起,或外寇觊觎者多矣!申屠刚曰:‘未至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必若待四方糜沸,如秦、汉、隋、唐之季,然后悔之,固已晚矣!”

元丰八年,在《请革弊札子》<sup>[2](P6689)</sup>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指明了神宗的开边政策是一切聚敛政策的总根源,是激化国内阶级矛盾的总根源。

元祐元年(1086),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他与两府宰执谈了自己的对夏方针,告诫他们,“不和西戎,中国终不得安枕”<sup>[2](P8754)</sup>,坚请放弃神宗朝强占的西夏六寨之地。

据司马光的高足刘安世回忆和司马光给吕

公著的信简,司马光在熙宁、元祐之初,曾两次上札谈及宋夏关系,有所谓的“富家之喻”。司马光用这个比喻生动地阐述了他的睦邻友好思想的依据,他说:“中国与夷狄为邻,正如富人与贫人邻居,待之以礼,结之以恩,高其墙垣,威其刑法。待之以礼,则国家每有使命往来,有立定条贯礼数束缚之也。结之以恩,则岁时尝以遗余之物厌饱之也。高其墙垣,则平时讲和而不失边备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边,然后当用兵也。今乃不用,是富者爱邻家贫民些小财物,开门延入而与之博。若胜焉,则所得者,皆微细弃贱之物,不足为富人财用多寡。若不胜焉,则富人屋宇、田宅、财物,皆贫家所有矣。又况博奕者,贫者日用为之,乃所工也,而富人之所短。贫人日夜专望富人与之博,但无路尔,今乃自家先引而呼之,贫人亦何幸哉!且富人之待贫人,至于用刑法,则是入官府也。至于无术矣!若不至于入官府处,则为善矣。且官吏之清严者,常云富人胁势以凌贫民,故贫民往往得理。今既用兵,则两国用兵之胜负,系之于天,岂知天之心不若清严官吏心乎?又况边隅无隙而已为兵首,乃最古今之大忌,则官中所谓先下拳者也,其败必矣!”<sup>[4](P367)</sup>

对于司马光的这番言论,我们切不可等闲看待,其语虽俚,其义颇深。立国于陕陇宁蒙青之间的西夏地瘠民贫,对于宋而言,的确恰如一个贫穷的邻居,其价廉物美的青白盐又被禁运,不得进入陕西内地销售,因此,它的财政不得不陷于困境之中。虽然它时时入境抄掠,但纵观北宋一朝,它从未深入陕西内地,这其中固然有孤军深入之忌,虑宋军断其后路,但料其本心,恐亦无拓境开疆之意。它只不过是武力为手段,取得财货、互市之利,以改善财政状况和人民生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宋如果能内修政理,国治兵强,并有限度地开通互市、给予岁赐,不能说不是一种有效的羁縻政策。不能想象,当一个贫穷的邻国艰于生存之中,富国能相安无事。尽管推行羁縻政策后,宋夏间小规模冲突还会不时发生,但两国间的和平基本上是可以维持的。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一直保持和平友好关

系,即是明证。神宗以后宋夏间的战争主要是宋方发动的。玩火者必自焚,故司马光断言其必败无疑。迄今为止,一般认为司马光对外执行的是屈辱忍让的方针政策,其实完全是一种误解和歪曲。司马光历来主张“国治兵强”、“不避强,不凌弱”<sup>[3](P600)</sup>,他临终前不久就曾严厉批评朝廷在处理辽方侵占河东火山军一事上态度太软弱:“土地者,国之本。若敌惟意所欲,无问多少,要取便取,成何国家?”<sup>[2](P8735)</sup>即为明证。

司马光以史为鉴,并审时度势,从当时国际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和平共处、华夷两安的治国方针,并终生为之奋斗不已,无论是从历代兴亡盛衰来看,还是从宋朝的历史和现实来看,都是明智而正确的。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来看,7—14世纪是中国又一个由统一到分裂至再统一的历史阶段。而宋王朝正处于这个历史阶段的分裂时期,准确地说,是分裂时期的后半期,即局部统一阶段。在这个阶段,辽、夏、金统一了中国的北部,而宋统一了中国的南部,南北双方势均力敌,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在这个阶段,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经历了250余年战乱后,人民要和平,经济要恢复、要发展。因而,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评价其各项政策,都不能脱离这个历史大背景,这是个大前提,是个大道理,一切政策正确与否,都应置于它的面前加以衡量。从这个大道理出发,来评判司马光维护和平、华夷两安的政治主张,我们认为它是完全符合宋朝的国家利益的,也完全符合当时人民最根本利益,因而是正确的。

## 二、和戎思想是中华民族对外政策的主流思潮

大约自秦皇、汉武以后,中国古代的政治精英们,鉴于大兵、大役造成的经济凋敝、社会倒退、家国覆亡的严重后果,和戎思想成为对外政策的主流思潮。司马光是其中的一员,其思想主张与之完全一致,是这种思想在宋代的代表之一。下面谨举例以证。

秦始皇在吞并七国,统一海内后,仍“务胜不休,欲攻匈奴”,遭到李斯的反对。李斯说:“夫

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胜必弃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国,甘心匈奴,非完计也。”但秦皇帝不听,仍命蒙恬将兵攻打匈奴,将其逐出河南地,以黄河为界。但战胜后如何守住新边疆,却是个严重的问题。河南“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踰河而北……又使天下飞刍輓粟,起于黄、腠、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由此引发秦末农民大起义,最终丧失天下。攻打匈奴的后果,已超出了李斯的预料,远不止“靡敝中国”了。

西汉初年,汉高祖平定天下,闻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反对,认为:“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但高祖不听,遂发兵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祖险为匈奴俘虏。高祖大悔,于是委派刘敬往结和亲,然后天下无干戈之事。

西汉元光元年(前134),武帝欲伐匈奴,主父偃上书,他即以秦始皇和汉高祖为例,向汉武帝进谏。主父偃指出匈奴地处草原与沙漠,生存环境恶劣,由此所形成的游牧习俗与“乌合而星散”的战法,汉军难于聚歼、完胜,军需供给十分困难,“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秦常积众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适足以结怨深讎,不足以偿天下之费。”他指出秦末“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权分二子”,就是由此而产生的。<sup>[5](P2799-2801)</sup>希望汉武帝能够深思慎行。

不久,匈奴欲和亲,大行王恢反对,他认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则主张和亲,他说:“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sup>[5](P2398)</sup>群臣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于是武帝同意和亲。

海南自汉武帝建立郡县以来,数年一反,汉则发兵平定。元帝初元元年(前48),珠厓(今海南省)又发生叛乱,连年不能平定。元帝召开会议讨论决策,有人提议调大军镇压。贾谊的曾孙捐之此时待诏金马门,他反对发兵。他认为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结果“天下溃畔”,二世而亡。孝文帝偃武兴文数十年,结果“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汉武即位后,改变了文景与民休息的政策,大肆对外扩张,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连年征战,国家财用不足,遂增重民赋,实行盐铁酒专卖的垄断政策,与民争利,又引发了社会内部的矛盾,“天下断狱万数”。“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捐之认为这都是“靡地泰大,征伐不休”造成的。有鉴于此,且关东饥馑,民众久困,连年流离,对于腹地关东,远在海外的珠厓,捐之认为“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

捐之的建议,得到了丞相于定国的支持。于定国认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最终元帝采纳了二人建议,撤消珠厓郡。这就是史上有名的“罢珠厓”。<sup>[5](P2831-2834)</sup>

新朝初年,王莽欲发三十万众,赍三百日粮,穷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韩邪十五子。莽将严尤表示反对,他认为匈奴为害,由来已久,但未闻上古时对其征伐的。后世周、秦、汉三朝对其征伐,然皆未有得上策的。“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獫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蠹蝨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他认为当时用兵匈奴有五难:“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鬴薪炭,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总之,严尤认为“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但王莽不听严尤的正确意见,坚持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引发了天下骚动。史臣说:“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王莽对匈奴的战争,动摇了新朝的统治基础,新朝只存在短短的15年便覆亡了<sup>[5](P3824-3826)</sup>。

及至唐朝,有名于世的治国政策,当数魏征的16字方针。唐太宗在与长孙无忌等谈话时说:“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耀兵振武,偃服四夷。唯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征之力也。”<sup>[6](P2558)</sup>高度评价了魏征提出的内政优先、和平发展方针。

贞观十一年(637),魏征上疏,在疏中,他探讨了隋朝灭亡的原因,说:“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sup>[7](P247)</sup>他认为“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是隋灭亡的原因。

开元为唐朝的鼎盛时期,这与玄宗启用姚

崇、宋璟是分不开的。先天时(713)玄宗平定太平公主集团,不久即启用姚崇。但姚崇并未立即答应,他向玄宗提出了10项改革意见,其中一项就是“不幸边功”。玄宗接受了这10项改革意见,姚崇才接受了相职。这就是后世艳称的“十事要说”。“十事”开元初皆已施行,故开元之世唐朝的国势达到了顶峰。

继姚崇之后为相的宋璟,也是位反对开边的名臣。早在武周时,“突厥默啜负其强,数窥边,侵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出,为其狙击斩之。入蕃使郝灵佺传其首京师,灵佺自谓还必厚见赏,璟顾天子方少,恐后干宠蹈利者夸威武,为国生事,故抑之,踰年才授右武卫郎将,灵佺恚愤不食死”。史言“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谓先见”。<sup>[8](P2383,P2394,P2395)</sup>

宋代对外政策的主流政见仍然是和戎。

雍熙三年(986)春,宋太宗再度北伐契丹。五月,开国元勋赵普手疏进谏,他认为:“飞挽日繁,战斗未息,老师费财,诚无益也。”在平定北汉,闽浙归顺以后,契丹不服,不足介意。他提醒太宗,“汉武时,主父偃、徐乐、严安所上书,及唐相姚元崇献明皇十事,忠言至论,可举而行”。并请太宗“精调御膳,保养圣躬。挈彼疲氓,转之富庶”。他自信,如果“边烽不警,外户不扃,率土归仁,殊方异俗,相率向化,契丹独将焉往”?<sup>[9](P8934,P8935)</sup>他在疏中还提醒太宗,大举北伐,“所得者少,所丧者多。又闻战者危事,难保其必胜。兵者凶器,深戒于不虞。所系甚大,不可不思”。事态的发展,不幸被其言中,不久,东路军“曹彬之师大败于岐沟关”,西路军名将杨业被俘而亡。太宗两次北伐,均以大败而告终。

战后数年,宋廷高层对与契丹战和决策进行了大讨论。

端拱二年(989),吏部侍郎李至上书太宗,请对契丹改行怀柔政策。他列举了汉高祖、汉文、汉武三朝对待匈奴的方式,认为汉初“民困已久,皆望息肩。高祖所以屈万乘之尊,舍骨肉之爱,为百姓请命于匈奴尔。百姓见高祖如此,则仁义浸于骨髓,感激盈于胸臆,始肯奋不顾命

以扞国。天意见高祖如此,始肯霈然垂祐,以致和平。遂以至愚之策而获万世之福,此理出于杳冥微妙,非寻常所能见也。至于孝文,能遵前训,亦不以万乘为贵,四海为大,卑事匈奴,所以海内富寿,粟腐贯朽,几致刑措。至于孝武承累代之业,任雄武之才,奋兵而出,收河南之地,取浑邪之域,摧凶殄寇,功冠前古。及其连兵不已,国家疲弊,户口减半,于是罢轮台之役,下哀痛之诏,然后仅安。则知威慑之与德绥,利害不侔矣,此乃前古之显效也”。<sup>[10](P567,P568)</sup>

淳化元年(990),太仆少卿张洎上疏言边防,他说:“夫御戎之道有三策焉……缮修城垒,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策之上也。偃革囊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戍,策之次也。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铤而肆战,决胜负于一时,策之下也……国家素失蓟北之险,亡控守之处,是上策不举也。屯兵平原,与匈奴转战,劳弊已甚,胜负未定,是下策不足恃也。审观天下之形势,忧患未已,唯与之通好,或可解纷。”他认为“自戎马生郊,边防受敌,兵连祸结,属载于兹”。“河朔之地,杼柚其空。邑里丘墟,黎元荡析。倘后日之战,复有杀将覆军之祸,则赵、魏、镇、定畴能守之?人心一摇,天下事去矣。”<sup>[2](P701-702)</sup>因此,他希望太宗能及时变更政策,化干戈为玉帛,与民休息。

淳化四年,吕蒙正复入相,因对,论及征伐。他说:“隋唐数十年中,四征辽碣,人不堪命……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他认为治理国家应先内后外的观点,得到了太宗的首肯<sup>[9](P9147)</sup>。

真宗即位后,终于于景德元年(1004)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两年后,又与西夏和谈成功。自安史之乱以来长达250年的战乱,终于结束。宋、辽、夏各方都迎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北宋名臣韩琦认为,宋无调兵于民之事,无杜甫《石壕吏》那样的诗篇,宋代百姓“虽税敛良厚,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父子兄弟夫妇免生离死别之苦,此岂小事”<sup>[11](P163)</sup>。他

对宋代和戎政策的评价是公允的。

### 三、神、哲两朝对外开边得失评价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以收复汉唐故疆为己任的他,立即发兵袭取西夏绥州,由此开启宋与西夏、交趾、河湟青唐羌、梅山蛮、五溪蛮、泸南夷等的战端。由于深入敌境,用兵不当,神宗时的战争多以失败而告终。

就对夏战争而言,熙宁四年(1071)宋将种谔谋取横山,领兵先城啰兀城,进筑永乐川、赏通岭二砦与抚宁故城。由于“啰兀城去绥德百余里,偏梁险狭,难以馈饷,且城中无井泉”,夏人反攻,“新筑诸堡悉陷,将士千余人皆没”。元丰四年,宋军五路进兵,欲夺取西夏巢穴兴庆府、灵武,覆灭之。结果夏人决黄河水拒以灌城下宋军营垒,复抄绝饷道,宋兵将冻溺饥饿,不战而自毙者数十万人。不久,又用徐禧深入进筑永乐城,永乐近横山,依山无水泉,被围后,城中乏水,渴死者大半,很快失陷。永乐之役,宋军“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死亡<sup>[9](P14009-14012)</sup>。永乐战败的消息传来,神宗“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sup>[12](P2837-2838)</sup>,神宗由此染疾,两年后辞世。对交趾之战,宋军虽耀兵富良江畔,兵临交趾首都升龙(今越南河内),但宋军将士瘁死者过半,达十余万人。退兵后,宋将夺回的羁縻广源州、思琅州及攻占的交趾苏茂州、谅州、门州及桃榔县给予交趾,宋朝邕管边界线反而较前向北收缩。对青唐的作战,取得了胜利,河湟地区基本收复。但宋所得多空城,并无尺赋斗租之人。朱熹说:“才夺得鄯州(今青海西宁市)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审,便命官发兵去守,依旧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归,朝廷又发兵去迎归,多少费力。熙河之败,丧兵十万。”<sup>[13](P679)</sup>因此,宋“自得熙河之地,岁费缗钱五六百万,后拔兰州,又费百万以上,所得愈多,所费愈广”<sup>[2](P8624)</sup>。

哲宗即位后,继承父志,继续对夏作战。但在战法上,他一改其父深入进讨的战术,而是采用了浅攻进筑的战法,不停地蚕食西夏战略要地横山,西夏丢失横山后,“横山强兵战马、山泽

之利尽归中国”<sup>[9](P10747)</sup>。丧失横山,西夏也丧失了赖以耕牧的良田牧场、膏腴之地。西夏人语,“唱歌作乐田地,都被汉家占却”,又云“夺我饭碗”<sup>[2](P11524)</sup>。西夏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主动请和,宋从此解除了百余年来西夏对边境地区的侵扰。但是,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宋君臣上下不得不承认国力、民力已困。元符元年七月,朝会时,仁宗屡顾执政曰:“民力已困。”众皆曰:“然”。曾布曰:“何止民力,公家之力且无以继矣!”<sup>[2](P11912)</sup>由此可见,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无论胜负,都是一把双刃剑。

可是,此时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却对此视而不见,穷兵黩武,主张西夺青唐(今青海西宁市)、邈川(今青海海东市乐都区),创置郡县,北越黄河,消灭西夏<sup>[2](P12301)</sup>。不久,哲宗去世,徽宗即位,继续开拓河湟,直到女真崛起,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亡北宋方止。此正应了《左传》所谓,“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的告诫。

对于神宗以后的收复汉唐故疆的做法,宋人多有微辞。神宗即位之初,向三朝老臣富弼访以治道,富弼知神宗果以有为,即答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sup>[9](P10255)</sup>南宋时的朱熹说得就直接了,他认为神宗:“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费了无限财谷,杀了无限人,残民蠹物之政,皆从此起。西番小小扰边,只是打一阵,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sup>[13](P679)</sup>从神、哲两朝对夏等作战的艰难来看,宋朝收复汉唐故疆,统一中国的时机远未成熟。实际上,两宋时中国正处于第二个南北朝时期,宋与辽、夏、金等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无论哪一方都无力实行统一,明智的对策应是和平共处,休养生息,积蓄国力,等待时机。

### 四、结语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爱好和平,反对不义的战争。对于战争性质的分析、评价有着不俗的见解。

西汉宣帝时,匈奴发兵袭击汉屯田之地车师。宣帝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敢复扰西域。御史大夫魏相进谏说:“救乱诛暴谓

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輒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他认为朝廷应关注民生困苦等社会问题,而匈奴的侵扰,只是“纤介之忿”。<sup>[5](P3136)</sup>魏相肯定义兵、应兵,而否定了贪兵等。宋人也持有与魏相相同的观点。仁宗时的近臣胡宿在论边事时说:“兵法所谓敌加于己,不得已而应之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sup>[14](P680)</sup>哲宗时,苏辙也说:“古之论兵者,以直为壮,以曲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连年入寇,边臣失律,败亡相继,然而四方士民裹粮奔命,唯恐在后,虽捐骨中野,不以为怨,兵民竞劝,边守卒固,而中国徐亦自定,无土崩之势。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祸,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顷自出师西讨,虽一胜一负,而计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宝元之多也。然而边人愤怒,天下咨嗟,土崩之忧,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sup>[15](P859)</sup>

如果从人道主义的高度来看,人与人之间应亲密友爱,国与国之间应睦邻友好。《易》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司马光的民族观正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肯定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也是人,一样拥有生存权。基于此,他对历代王朝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少数民族人民的残暴行为深为不满,他说:“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因此,可以说,司马光民本思想里的“民”也包含着各少数民族人民。他在《通鉴》里,多次揭示出各族人民起来反抗残暴统治的原因,基本上肯定了他们反抗斗争的合理性。他说:“羌之所以叛者,为郡县所侵冤故也。”他说:“御之不得其道,

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否?”<sup>[15](P1817)</sup>司马光在生命最后的日子,曾亲笔起草了一篇《抚纳西人诏意》,文中司马光提出了“靡间华夷,视之如一”的民族平等思想。他希望从今以后宋夏之间“桴鼓不鸣,烽燧无警,彼此之民,早眠晏起,同底泰宁”<sup>[2](P9064-9065)</sup>。司马光是北宋道学六先生之一,对儒家思想在北宋时期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外交、民族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对我们今天治国安邦仍然具有启迪意义。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主席说:“中国需要和平、爱好和平,也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真诚帮助仍然遭受战争和贫困煎熬的人们。”<sup>[16]</sup>习主席的这番话,是中华民族这一优秀遗产在今天的发扬光大,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武器。

#### 【参考文献】

-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3]司马光.传家集[M].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
- [4]刘安世.元城语录解[M].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
-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吴兢.贞观政要[M].北京:中华书局,1978.
-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0]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M].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
- [11]罗大经.鹤林玉露[A].笔记小说大观本[C].扬州:江苏广陵刻印社,1983.
- [12]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 [13]李光地.御纂朱子全书[M].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
- [14]胡宿.文恭集[M].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
- [15]苏辙.栟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6]习近平.和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基因[N].光明日报,2014-09-30.

【责任编辑:王立霞】